

北京的新政治廣場*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72 pp.

洪長泰**

在西方的中國研究中，城市史近年來發展成爲一門顯學。這些城市史的著作，大略可以分爲幾大類：社會史、商業史、文化史、政治藝術史等。巫鴻教授的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是屬於政治藝術史一類。

巫教授是一位藝術史家。早年肄業於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任職，後負笈美國，1987年在哈佛大學取得藝術史博士學位，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巫教授雖然主力研究中國上古和中古時期的美術史，尤其是青銅禮器和墓葬藝術方面，但也發表過不少有關中國現代和當代美術的評論。*Remaking Beijing* 一書既是城市史的探討，也是屬於當代美術史的研究。巫教授的研究範圍甚廣，牽涉的問題也非常複雜，所以作品質量難免有些參差，本書即是一例。

* 本書評初稿，蒙陳永發教授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書的內容

除了導言與尾聲之外，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前半部討論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建築物，描述廣場自明清以來的沿革，後半部探討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造經過及其象徵意義。第二章分析天安門城樓的歷史及城樓前懸掛的巨型毛澤東像的繪製經過。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後，此城樓變成了共產中國的官方圖像代表，出現在國徽、鈔票及無數政府公文及宣傳文件上。又自1949年以來，天安門城樓前總是掛有巨型的毛澤東肖像。巫教授認為，官方在繪製毛的肖像時，並不注重其藝術性，所以只是找一批專業的肖像畫家，依照毛的照片來製作及潤色。肖像裏的毛澤東就隨著年歲增長而變化，但他總是凝視及俯瞰整個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顯示其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並象徵共產黨在中國的專政。

第三章討論天安門前的慶典活動和「十大建築」，尤其是關於人民大會堂及革命和歷史博物館的建造經過。1949年10月1日，中共的開國大典分閱兵和群眾遊行兩部份活動。以後每年的遊行，不單在國慶日，也在5月1日的國際勞動節舉行；地點不限於北京天安門，更包括上海等大城市。¹五一強調勞工神聖，通常只有群眾遊行，沒有閱兵，雖然規模不遜於十一，但巫教授對之並無任何討論。此章最後一節簡單介紹了毛逝世後官方在天安門廣場南端興建「毛主席紀念堂」的經過。

第四章以北京中軸線北端的鐘樓和鼓樓為中心，分析中國傳統的時間概念及其政治意義。巫教授認為明清時代京師敲鐘擊鼓以報時，既清楚規定了居民的作息時間，也代表了官方的無上權威，因為只有朝廷才能制定劃一的時間。後來西方的自鳴鐘和鐘樓模式傳入中國，才改變了傳統的報時方式。這些新的科技，一方面表示現代化，另一方面也顯示外國勢力在中國日益增強。

¹ 有關上海的五一遊行，參考〈上海人民慶祝一九五四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程序、主席團名單及籌備委員會名單、規定、計劃、總結〉，上海市檔案館藏，B56-1-2。

章末討論 1997 年前，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革命和歷史博物館前建立香港回歸倒數計時器。巫教授稱此鐘為「政治計時器」(political timer)，因為它象徵國家控制回歸的時間，用以宣示擁有香港的主權。

第五章討論廣場從傳統到現代不同時期的藝術表達形式。此章特別精彩，巫教授回到他最為熟悉的藝術史領域，因此可以充分發揮其專業所長。他認為 1980 和 1990 年代是中國大陸比較開放的年代，大陸的藝術家擁有比較廣闊的創作空間，所以一些年輕藝術家能夠以繪畫、照片、設計和前衛展覽等形式，描述天安門廣場的不同面貌。他們強調個人的創作自由，與政府的集體主義理念大相徑庭。他們的作品代表自我解放，勇於創新，不再盲目追隨毛澤東思想。

書的結尾部份，簡單談及北京未來的城市發展，包括新的南北及東西兩條軸線、多中心城區和幾條新環路的開拓。巫教授認為自 1977 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後，天安門廣場再沒有新增建築物。雖然整個首都的面貌都在變，但唯一不變的是天安門廣場，它仍然是中共舉行大型慶典的場所和全國的「觀念中心」(conceptual centre) (頁 240)。巫教授認為六四事件之後，官方改變策略，在喜慶節日，把原先莊嚴的廣場改頭換面，以大量鮮花和精巧的人工模型（如人造噴泉）作為點綴，增加歡慶和諧的氣氛。這類人工製作，作者稱為「軟性紀念物」(soft monuments)，有別於人民大會堂之類的「硬性紀念物」(hard monuments) (頁 242)。政府的目的顯而易見，是企圖把這個政治廣場「非政治化」(depoliticize) (頁 243)，以贏取民心。

全書大略可以歸納為三條主線：一是天安門廣場如何在中共建國後發展成為滿布大型政治紀念建築物的神聖之地。二是官方透過圖片、雕塑和國慶遊行，把廣場塑造成為代表中共統治全國的政治空間，從而編寫其光榮革命史及肯定其合法統治地位。三是改革開放之後，官方不能再對天安門廣場實行絕對的操控，民間藝術家利用廣場去表達一些有別於官方的形式，創造出一種「前衛的空間」(space of the avant garde) (頁 10)，來抗衡天安門廣場這

個官方聖地。

此書的敘事手法十分特殊，巫教授稱之為「兩種平行敘事」(two parallel narratives) (頁 11) 的方式，一方面以第三人稱講述天安門歷史，另一方面又以第一人稱回憶個人在北京成長過程中的有關經驗。例如，學生時代多次參加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文革初期因為「資產階級」家庭背景（父母均留美）被批、參加 1976 年天安門廣場追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集會等等。這種歷史與自傳的交叉敘事寫法，巫教授認為「對這本書特別切題」，因為兩者的焦點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集體記憶。

這一部力作，建基於「檔案、建築方案、回憶錄、照片、圖像和二手研究材料」(頁 11) 之上，資料豐富。其重點雖是討論城市的政治藝術，但也涉及「歷史、回憶、自傳」(頁 11) 等範圍，所以是一本跨學科的著作。書的印刷非常精美，圖文並茂，充分發揮了藝術史家「以圖說理」的長處。但因為全書覆蓋的範圍廣，牽涉的問題多，要掌握的材料非常複雜，難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限於篇幅，下文只簡單討論書名、資料來源、書寫方式和一些重要遺漏。

書名及廣場的性質

先說書名。此書雖名為 *Remaking Beijing* (試譯之為《重造北京》)，但重點卻並非討論 1949 年後中共如何重建新首都這一段歷史，而是探討副題中有關天安門廣場的修建及所代表的不同政治意義。巫教授也承認：“This book will focus on the Square” (頁 9)，故書名易為 *Remaking Tiananmen Square*，或許會比較適合。

巫教授認為中共在建國初年，決定把行政中心設在以天安門為中心的舊城區，便已經把未來五十年北京總體規劃的方向定了下來。這種看法，相當中肯。1950 年 2 月，清華大學建築學者梁思成和城市規劃家陳占祥向中共中央提出著名的〈梁陳方案〉，主張重建首都時保留北京舊城，另外在西郊公

主墳附近建立新的行政中心。²但此建議遭到朱兆雪和趙冬日等建築家和北京市規劃局及蘇聯專家的反對，理由是另建新城耗資巨大，不切實際。³當時中共中央已遷進中南海，毛澤東一直認為天安門前發生的五四愛國學生示威，直接催生了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⁴視天安門舊城區為新政府行政中心的理想位置，所以否決〈梁陳方案〉。從此以後，中共就以天安門為中心來籌劃和設計首都北京的發展，並在 1950 年代把天安門前的場地，從一個傳統封閉的宮廷地方擴展成爲一個巨大無比的公共廣場。

天安門廣場是一個政治廣場，已是不爭之論。但此書既以「一個政治空間的建造」(“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爲副題，讀者自然希望從中了解此政治廣場是如何「建造」的？其決策過程如何？依照甚麼模式興建？是本土形式，或是參照外國樣本？官方希望透過廣場表達甚麼政治意義？重建廣場時有沒有爭論？巫教授對於這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交代得並不清楚，提供的資料和證據也不充分，尤其是有關 1949 年後廣場擴建的歷史及引起的爭議，著墨太少（頁 8），⁵只簡略談及建國後，毛澤東下令建造一個可容「百萬人集會的廣場」，所以政府在 1950 年代拆除長安左門及長安右門（俗稱東三座門和西三座門）、中華門及廣場原有的圍牆等建築物，改變了明、清以來天安門舊有的 T 字形狀，最後擴展成爲一個 44 公頃的巨型廣場(頁 23-24)。敘述失之過簡，既未追溯廣場變革的來龍去脈，也未能深入分析各界對於廣場性質的爭論，而這兩個問題，卻正應成爲全書的核心。

事實上，中共建國初年，對於如何建造一個新的天安門廣場，一直有不同的聲音，也有不少爭議，官方和學者之間，更存有嚴重的分歧。此處只舉

² 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收入梁氏著，《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出版社，1986），卷4，頁1-31。

³ 〈朱兆雪、趙冬日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1950年4月20日），收入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卷1，《城市規劃》（北京：出版社缺，1987），頁202-209。

⁴ 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卷2，頁545-547。

⁵ 有關這些爭議，巫教授簡單引述了王軍的《城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一書。但王書討論蘇聯專家的參與，並不深入。

兩例。1949年來華的蘇聯城市規劃專家巴蘭尼克夫(Белеников)，率先提議在廣場的東西兩側和東單等地方設立中央政府的行政辦事處，⁶沒有得到中方的接納，後來廣場周圍都是大型的紀念建築物。另一個例子是，爲了擴建廣場，拆除大批舊有建築物，譬如1952年拆除長安左、右門。梁思成視北京舊城爲「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⁷力主保護舊城牆和保留舊都，不要輕易改動原貌，對拆除長安左、右門尤其極力反對。⁸表面上是城牆去留的爭論，實際上是牽涉廣場性質的界定：天安門廣場究竟應該發展成爲文化廣場呢？還是政治廣場？梁思成顯然傾向前者，而官方的目的則是後者，用1950年《人民畫報》的一句話說，修建廣場的目的之一，是「讓更壯大的〔遊行〕隊伍通過，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⁹

巫教授說他參考過一些「檔案」，但實際上他引用的檔案資料不多。官方公布的檔案文件中，就有不少有關當年天安門廣場重建的資料。例如，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的〈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和〈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這兩個檔案，就保存不少當時參與建設新首都的人提出的不同方案。¹⁰除了北京市檔案館之外，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也儲存不少有關天安門廣場規劃的材料。譬如，其中一份1950年的檔案〈天安門廣場東西兩端道路系統設計說明書〉，就清楚說明當年北京城市規劃管理局已經提出要在天安門城樓前建造一條「遊行道」，以便「能應付將來一百萬人隊伍的大遊行」的意見。¹¹這份資料，顯然回應了毛澤東要把天安門廣場擴建爲可容「百萬人集會的廣場」的構想。重建天安門廣場是一項複雜的政治決定，個中不乏爭論，不看檔案資料，便難窺全豹。

⁶ 〈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1949年對北京總圖的建議之二——東單至府右街幹路及天安門廣場行政建築設計計劃圖〉，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C1-308-3。

⁷ 梁思成，〈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收入氏著，《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卷4，頁51-66。

⁸ 〈梁思成關於民族形式、保留古物的言論匯集〉，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C3-80-2。

⁹ 〈讓更壯大的隊伍通過〉，《人民畫報》，卷1期4（1950年10月），無頁數。

¹⁰ 〈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150；〈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151。

¹¹ 〈天安門廣場東西兩端道路系統設計說明書〉，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C2-46-2。

資料來源

此書的另一缺點是對於資料來源交代不夠清楚。筆者試舉二例。巫教授說人民英雄紀念碑坐南向北，違反傳統，是北京市長彭真下的命令，而此決定是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的」（頁27），但對此重要說法，巫教授沒有交代資料來源。事實上，有關紀念碑坐向的問題，一直有爭議。筆者看到比較可靠的兩種說法，一是清華大學建築系吳良鏞所說的實際效用。吳教授說：「關於碑的面向問題，最初設計根據傳統布局，以朝南方向作為主要立面。在建造過程中（當時巨大的碑心石已運至工地南頭），周總理考慮到廣場擴建以後，會有更多的人群從城市主要大街——東西長安街進入廣場，並集中在廣場北部，所以能從北面看到毛主席題字為好，經毛主席同意，一反傳統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為主要立面。」¹²另一說是為了打破傳統而採用朝北的面向。曾參與建造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師張鏞說：「人民英雄紀念碑向正北，既否定帝王將相的習俗，又充分肯定了文化遺產的完整。」¹³可惜吳沒有說明資料來源，而張也沒有交代誰是紀念碑坐向的最終決定者。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一個重大的決定，非中央最高領導人親自審批不行。但研究歷史，講的是證據，在還沒有找到可靠的檔案文件來印證之前，我們只能猜測而已。

第二個例子是有關國慶遊行時隊伍排列的次序。巫教授不知何所據，說國慶時天安門廣場遊行的先後次序，是至1952年10月1日才被官方確定下來，一共分七組，它們的排列次序成了以後遊行的「藍圖」（“a blueprint”）。此七組順序是：一、軍隊；二、儀仗隊（由工人、腰鼓隊和少先隊等組成）；三、工人；四、農民；五、政府機關人員、學生、商人和城區市民；六、體育大軍；七、文藝大隊（頁99）。但根據檔案資料顯示，1952年的國慶遊行，

¹² 吳良鏞，〈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創作成就——紀念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廿周年〉，《建築學報》，期2（1978），頁7。

¹³ 張鏞，《我的建築創作道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4），頁86。

並不是分七組，而是分十二組。除了軍隊外，其他十一組統稱為「群眾遊行」，它們是：「一、儀仗隊；二、少年隊（又稱少先隊）；三、腰鼓隊；四、工廠；五、農民；六、機關；七、學校；八、工商界；九、城區；十、運動員；十一、文藝大隊。」¹⁴換言之，這次群眾遊行，並非如巫教授所說的，把政府機關人員、學生、商人和城區市民合編為一組，而是把他們當作不同單位來排列。

寫作方法

全書用了作者稱為「兩種平行敘事」的寫法，的確令讀者耳目一新。但是這種半敘事半自傳的筆法效果又是如何呢？是否客觀？能否把問題說得清楚？誠然，德國哲學家 Wilhelm Dilthey 認為，自傳是了解人類過去生活最有意義的方法，因為它描述的是個人生命的真實感受，可以產生一種「特殊的親切了解」（“a particular intimacy of understanding”）。¹⁵但 Dilthey 的觀點引起了不少爭議；反對者認為歷史和自傳的性質畢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記錄的是集體的經驗，而後者則是個人的回憶；前者的可信性來自客觀事實，可以用一些比較清楚的方法去驗證，而後者大多是主觀的看法，難以稽考。但筆者認為敘事和自傳式的雙重寫法，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因為兩者大都是按時間先後來敘述；而且當事人（即參與者）的經歷，是集體經驗的一小部份，故自傳可作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歷史事件的發展，補充史實的不足。

筆者要強調的是，運用這種雙重寫法時，務必要特別小心，最重要是先將兩者的輕重先後（在描述史實時，自然是以事件為主，個人的回憶為輔）和它們之間的矛盾講清楚，才會有說服力。巫教授承認加插進去的自傳是他個人「片斷的經歷」（“fragmentary experiences”）（頁 11）；但在書中，他有

¹⁴ 〈首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籌備委員會群眾遊行指揮部〉，北京市檔案館藏，99-2-1。

¹⁵ Wilhelm Dilthey, *Pattern and Meaning in History: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H. P. Rick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 86.

時卻把這種「片斷的經歷」說得多了，反而把主要事件交代得不清晰。試舉一例，巫教授在第三章中回憶他少時在北京西直門外參觀 1954 年落成的蘇聯展覽館（即現在的北京展覽館）的經驗。他第一次看到這座象徵中蘇友好的宏偉展覽館時，讚歎不已。館內的碩大圓柱、美輪美奐的餐廳和精湛的芭蕾舞表演等等，都令他難以忘懷（頁 104-106）。但作者對於蘇聯展覽館的來龍去脈卻未有探討。究竟展覽館是如何籌劃的？誰曾經參與工作？中蘇雙方的建築師是否對於設計方案有過爭議？這些問題，書中都缺乏交代。儘管這一章巫教授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十大建築」，而非蘇聯展覽館，但因為主題是討論建築文化，而蘇聯展覽館的設計牽涉到蘇聯建築模式對於中國的影響，包括是否影響到後來「十大建築」的設計，故有必要多花筆墨，而非只以遊記的方式作簡單的描述。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有關蘇聯展覽館的資料已經出版了不少，包括記載中方主要建築師戴念慈的參與經過，從中可以了解到這座大型蘇式建築物在新首都建築史上所佔的位置。¹⁶

蘇聯專家

此書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討論蘇聯專家對於擴建天安門廣場的影響。事實上，研究中共歷史，尤其是 1949 年後的發展，不能不提蘇聯在中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毛澤東於 1949 年 6 月提出中共的外交政策要向蘇聯「一邊倒」，接著又於 1950 年 2 月簽訂中蘇同盟，¹⁷隨後就有大批蘇聯專家到中國，幫助新中國的建設。據初步統計，自 1950 至 1956 年，來華的專家就有 5,092 名之多。¹⁸他們被分派到政府、軍隊、重點企業和大專院校各部門工作。1949 年後北京市的重建，尤其是有關天安門廣場的規劃，蘇聯專家也有甚多參與。

根據目前所能看到的檔案資料，在來華的蘇聯專家中，至少先後有三批

¹⁶ 可參考萬千，《建築師戴念慈》（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頁27-44。

¹⁷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卷4，頁1477。

¹⁸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頁4。

城市規劃家和建築師，直接或間接參與新首都的規劃和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工作。第一批於 1949 年 9 月 16 日中共建國前抵達北平（10 月 1 日後改名北京），由 17 名蘇聯專家組成，其中包括了前面所說的市政專家巴蘭尼克夫；¹⁹稍後於 1950 年代初期，又有一批蘇聯專家抵華，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穆欣（又譯莫辛；А. С. Мухин）和巴拉金（Д. Д. Барагин）這兩名城市規劃專家。²⁰第三批是分別於 1955 年 4 月及 7 月抵達北京，共有 9 名專家，其中包括組長規劃建築師勃德列夫（С. А. Болдырев）、組員規劃專家茲米耶夫斯基（В. К. Змиевский）、城市設計專家阿謝耶夫（又譯阿謝也夫；Г. А. Асеев）等人。這些專家，對於如何重建北京市，提出了不少建議。²¹建國初期中蘇關係密切，有些中國人把天安門廣場比喻為莫斯科的紅場。當時，像「天安門廣場是中國的紅場，是全國人民的紅場」這樣的說法，非常流行。²²而一些蘇聯專家，在規劃天安門廣場時，也自然以紅場為藍本。例如，有關天安門廣場的面積問題，蘇聯專家認為應該像 9 公頃的紅場一樣，不必太大。但當年中國方面提出的天安門廣場規劃，有 20 公頃、30 公頃和 50 公頃等幾個方案。²³巴拉金等人認為當時的北京人口只有 140 萬，所以改建的天安門廣場不需要太大；而且一般的廣場都只有「五、六公頃」，一個 40 公頃的廣場，已經「不是廣場〔，〕而是像列寧格勒的練兵場。」²⁴但中方高層不同意這種看法，堅持要在首都建造一個巨型廣場，以容納每年參加國慶和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幾十萬群眾。

¹⁹ 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篇史料徵集編輯辦公室編，《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篇》，卷1，《規劃建設大事記，1949-1995》（北京：出版社缺，1998），上冊，頁6。

²⁰ 〈蘇聯專家莫辛對北京市總體規劃的意見〉，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C3-86-1。

²¹ 〈蘇聯專家巴蘭尼可夫對北京市中心區及市政建設方面的意見〉，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C3-85-1。

²² 〈首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籌備委員會群眾遊行指揮部〉，北京市檔案館藏，99-1-34。

²³ 楊念，〈一段溫馨的回憶〉，收入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徵集辦公室編，《規劃春秋》（北京：出版社缺，1995），頁161。

²⁴ 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整理，〈蘇聯專家對天安門廣場規劃草案模型的一些意見〉（1954年9月13日），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藏，3-7-14。

至於天安門城樓前長安大街的寬度問題，中蘇專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在1950年代初的規劃中，中方認為長安街是首都最主要的幹道，寬度應為110至120公尺之間。²⁵蘇聯專家則認為當時北京的車輛不多，長安街不必太寬。蘇方的模式來自高爾基大街（Улица Горького；即現在的特維爾斯卡亞[Тверская]大街）。高爾基大街是莫斯科的著名大道，為慶祝十月革命的遊行隊伍通往紅場所必經之路，它的寬度只有61公尺左右。²⁶蘇聯專家的意見不獲中方接受。北京市長彭真認為：「道路不能太窄。一九五三年提出東單至西單的大街寬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大馬路主義就大馬路主義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發展的需要。……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會是太寬。」²⁷彭真的話代表中共最高層，他的理由很清楚：配合十一國慶及五一勞動節大型遊行的政治需要，來建造一個巨型的廣場和一條寬闊的長安街。彭真還說：中國不能「甚麼都跟在人家後邊走。要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考慮。」²⁸顯然，強調要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也是中國不願接受蘇聯專家看法的重要理由。可惜，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巫教授的書非常欠缺。

整體而言，此書對於天安門廣場的建築及其紀念意義、政治空間的布局和近年來北京出現的新藝術，都有相當深入的探討。但對於建造廣場的背景、背後的爭論、資料的來源和蘇聯專家的影響等問題，卻交代得不足。

²⁵ 楊念，〈一段溫馨的回憶〉，收入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徵集辦公室編，《規劃春秋》，頁162。

²⁶ Andrei Ikonnikov, *Russian Architecture of the Soviet Period*, trans. Lev Lyapin (Moscow: Raduga Publishers, 1988), p. 185.

²⁷ 彭真，〈關於北京的城市規劃問題〉，《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307-308。

²⁸ 彭真，〈關於北京的城市規劃問題〉，《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頁309。